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师范大学“985”资助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权威报告

总主编：陈佳贵

REPORTS ON THE EQUITY OF
THE BASIC PUBLIC SERVICES IN CHINA FAIRNESS
——PROSPERITY AND OPTIMIZING
GOVERNMENT BEHAVIORS

2011

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发展报告

——公平、繁荣与政府行为优化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编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师范大学“985”资助项目

CASS 中国社会科学权威报告

总主编：陈佳贵

REPORTS ON THE EQUITY OF
THE BASIC PUBLIC SERVICES IN CHINA FAIRNESS
——PROSPERITY AND OPTIMIZING
GOVERNMENT BEHAVIORS

2011

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发展报告

——公平、繁荣与政府行为优化



YZLI0890122070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编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报告. 2011/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编.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5096-1717-5

I. ①中… II. ①北… III. ①社会服务—研究报告—中国—2011 IV. ①D66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50479 号

出版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11 层

电话: (010) 51915602 邮编: 100038

印刷: 北京银祥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组稿编辑: 陈 力

责任编辑: 杨国强

责任印制: 木 易

责任校对: 超 凡

880mm×1230mm/16

25.25 印张 543 千字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98.00 元

书号: ISBN 978-7-5096-1717-5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由本社读者服务部

负责调换。联系地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 (010) 68022974 邮编: 100836

“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报告 (2011)” 课题组

课题负责人

杨冠琼

课题协调人

果 佳

课题组成员

(按姓氏拼音排序)

戴 伟 果 佳 何 瑛 李克强 李燕奇 吕昕阳
屈 浩 孙 宇 唐任伍 汪大海 王 颖 王宏新
王洛忠 杨世文 叶先宝 喻 匀 章文光 周 亚

撰稿人

(按姓氏拼音排序)

川口兴有 戴 伟 管 振 果 佳 何 瑛
贺 军 李 帆 李 玲 李克强 李燕奇 刘文波
刘雯雯 吕昕阳 罗 植 聂正标 屈 浩 孙 景
孙 宇 王 颖 王宏新 王洛忠 温 竹 谢 晏
杨 迪 杨世文 叶先宝 尹宗平 喻 匀 章文光
周 亚 周 瑜 周 拯



有效推进共享人类社会发展成果，全面提高人类福祉，让现代人类文明惠及每一个社会，惠及每一个人，是 21 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新问题、新挑战，是自 21 世纪起所有社会公共治理创新、完善的一个核心理念与主题，也是优化政府行为的一个核心理念与主题。

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正是使现代人类文明的巨大恩惠普照社会、普照每个人的重要途径与方式，也是人类社会孜孜追求公平与繁荣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目标与结果。因此，准确把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涵义、结构、范围、水平、发展过程与趋势、提供方式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大意义，必须将视野与心智模式投放到恰当的理解公平与繁荣间相互促进的、更为一般的语境中。

公平与繁荣始终是人类社会关注的核心问题。公平与繁荣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然而公平与繁荣都深深地依赖政府行为，依赖社会治理结构。其原因：①市场失效造成资源配置未必流向回报最高的方面，因而基于能力与机会公平的市场机制经常导致“条件依赖性机会”的不公平。②相关公共政策，特别是基本公共

服务，经常会系统地偏向于影响力较大的群体的利益，条件优越者能获得更多与更好的基本公共服务，影响力较大群体成为公共服务的最大受惠群体。这种状况的持续存在，不仅造成社会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率锁定在劣帕累托效率或非帕累托效率状态，更容易引起社会公平感的缺失，导致社会交易成本呈指数方式增长。

③公平缺失将严重抑制个体创新动机与机会，严重阻碍社会结合方式创新，丧失社会创新机会，从而导致社会在自然演化过程中面临各种危机甚至是生存危机。因而完善社会治理结构，优化政府行为，是实现公平与繁荣相互促进的重要机制与保障。

近年来，公平与繁荣成为中国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为促进公平与繁荣的良性循环，强化社会公平与繁荣的相互促进，2010 年 9 月 16 日，胡锦涛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部长级会议上提出，“我们应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我们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

善民生,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注重解决教育、劳动就业、医疗卫生、养老、住房等民生问题,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为实现上述理念与目的,中国“十二五”规划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基本理念转化为公共政策实践,并根据“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方针,确定了“十二五”期间中国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与重点,目标是实现公共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人口计生、住房保障、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个新课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绝不意味着平均主义,因为平均主义必将导致衰败,这是人们的共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依赖于社会财富的持续增长,这也是人们早就具有的常识。那么,如何把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社会财富的持续增长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基本公共服务,如何界定均等化,如何认识基本公共服务及其均等化怎样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如何确定其范围、结构、水平以及提供方式,如何理解基本公共服务的决定因素,如何理解中国确定的基本公共服务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关政策的有效性以及可持续性,等等,都需要进行解释、说明与描述,因而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探索。

为恰当理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社会财富的持续增长之间的关系,把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社会财富持续增长之间的微妙平衡,我们将其置于公平与繁荣的框架中来理解、研究。从公平与繁荣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来把握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相关社会价值的选择,从而正确理解与确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范围、水平及其演进趋势。

为适应公平与繁荣之间关系理解的社会需求,以及适应实现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论需要与现实需要,本报告在基础理论与基本实践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本书系统地论述了公平与繁荣相互促进的关系,梳理了社会公平的规范性概念体系,解析了社会公平的性质与结构,探讨了社会公平的价值组合与测量途径,论述了社会公平的决定因素、机制与历史演变。在此基础上,实证性地研究了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状、发展过程、存在问题及形成原因,尝试性地提出了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可供借鉴的政策选择。同时,对公平与繁荣的相关理论问题进行了专题性的理论探索。

本书对于深入理解社会公平的规范性概念以及社会公平的实证性演进,对于理解公平与繁荣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与了解中国基本公共服务(主要包括基础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人口计生、公共文化、住房保障等)均等化的现状以及未来趋势,对于测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式的完善,以及对于选择与实施促进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相关政策,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公平与繁荣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我们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这些方面的探索也仅仅是一个开始与尝试,对现实状况的描述与分析还缺少更为具体与细致的数据,对相关问题的识别与归因仍有待深入探索,以及相关的理论分析与提出的理论主张

前言 ◀◀◀◀◀ 3

与政策主张亦存在诸多瑕疵，实有待完善。由于研究水平、研究能力以及相关资料的有限与约束，本书存在某些片面与偏颇在所难免，诚挚欢迎各界同仁斧正，以资为鉴。

杨冠琼

2011年11月5日于北京

绪论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何意义重大? / 1

第一部分 总报告

中国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决定与总体特征 / 17

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现状、存在的问题及政府行为优化 / 44

第二部分 公平体系与价值追求：基本概念与规范性理论

公平的性质、结构与规范性理论 / 87

价值的网络化组合、公平的测量与政府行为优化 / 107

第三部分 专题报告

中国基础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政府行为优化 / 147

中国社会保障服务均等化与政府行为优化 / 169

中国就业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政府行为优化 / 192

中国人口计生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政府行为优化 / 211

中国住房保障服务均等化与政府行为优化 / 243

中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与政府行为优化 / 257

中国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与政府行为优化 / 283

第四部分 理论探索

社会公平与社会稳定——中国突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内生性因素及其临界值 / 325

政策偏好、基础教育责任分担与非均衡发展 / 340

晋升锦标赛与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发展失衡 / 368

协同效应、政府行为互补性与社会经济绩效 / 381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过程中涌现出的一个时代性的、重大社会问题，其既是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人类社会孜孜追求公平与繁荣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目的与结果。有效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至少是 21 世纪人类社会公共治理发展、完善核心理念与主题。准确把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全部涵义、结构、范围、水平、发展趋势以及提供方式，以及其重大意义，必须将视野与心智模式投放到恰当的理解公平与繁荣间相互促进的语境中。

繁荣是一切生命体的本能追求

繁荣是一切生命体的本能追求。自其生成以来，各种动物、鸟类以及鱼类为了类的持续生存、生育、遗传、繁荣，为了寻求适合于生长的水源丰富、植物繁茂、食物充足、温度适宜的环境，而不惜牺牲个体生命为代价年复一年地不停地大规模迁徙。这种为了繁荣而进行

的动物大规模迁徙的壮丽景观，至今仍在非洲撒哈拉、马萨伊马拉大草原上连年上演。

为了种群繁荣而不断上演的动物大迁徙也是原始人类或远古人类大迁徙活动的再现。或由于气候的变迁或由于人们抵抗自然能力的低下，远古人类为了种群的繁荣，为了种类的生生不息，自地域辽阔、广袤的非洲开始了向亚洲、欧洲的大规模迁徙。“地中海民族、埃特鲁里亚人、辛布里人（Cimbres）和条顿人进行了大规模的迁徙，有时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布罗代尔，2005）。各类族群迁徙途中不仅要与自然环境、自然祸害进行生死的抗争，也要与各种从来没有见过的大型凶猛的飞禽、野兽以及形体较小但凶险万分的爬行类与飞行类天敌进行殊死的搏斗，更要与同为人类但不同种别的族群进行惨绝人寰的战争。

在这种大规模长途迁徙中，多少族群为了繁荣而遭遇灭绝之灾难，多少族群为了繁荣而沦为了奴隶，多少族群为了繁荣而枯萎。然而，繁荣对人以及其他动物的吸引力如此之大，虽

然历尽无数劫难,人类与其他动物依然为了繁荣而迁徙,在这种追求繁荣的迁徙过程中最终获得繁荣。

人类以及几乎所有生命体之所以都本能地甚至不惜牺牲个体生命为代价地追求繁荣,就在于繁荣为生命体注入了生命的动力从而使其充满活力。繁荣形成正反馈机制促发了进一步的繁荣,从而使最有利于生命体目的的实现的各机制与要素不断地演化。柳永在《望海潮》中描述的“钱塘自古繁华”景象,正是繁荣的一种场景:

“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以及“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

同样,柳永的《破阵乐》以极其欢欣、快乐的笔触,描述了京都繁荣之景象:

“露花倒影,烟芜蘸碧,云沼波暖。金柳摇风树树,系彩舫龙舟遥岸。千步虹桥,参差雁齿,直趋水殿。绕金堤,曼衍鱼龙戏,簇娇春罗绮,喧天丝管。霁色荣光,望中似睹,蓬莱清浅。”

而王建的“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升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以及李绅的“夜桥灯火边星汉,水郭帆樯近斗牛”则描述了繁荣的另外一番景象。

这种繁荣景象令人赏心悦目、怡然自得、宁谧和谐。这种繁荣景象与张正见的《赋得寒树晚蝉疏》所描述的“寒蝉噪杨柳,朔吹犯梧桐……还因摇落处,寂寞尽秋风”的萧条、衰败之景象形成鲜明对照。萧条、衰败是一种生

命抑制、死亡的状态,是一种迅速减弱生命物生存所依之源泉的机制,是将欣欣向荣扼杀在萌芽初期的一种结构。

每种生命体都先天地、内在地储存着其生命的目的,而这种目的的实现依赖于其实现活动。繁荣既是生命体目的的最佳实现的结果,也是生命体最有效、最完全、最彻底地实现其目的的途径。每种生命都积极地实现着它的活动,成为它之所是。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隐德来希”。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道出了一切生命物的目的及其实现活动。任何生命体的如他所是的属性,决定了如他所是的目的以及目的实现活动。任何生命体目的的实现活动与过程,都不受别人命令的干扰,也不是别有什么企图,只是出于其本性,自然而然,不得不然,直到生命体的尽头,直到他不再是他所是。

理性、繁荣与衰败

人类作为生命体中的一个类别,其目的的实现不同于其他类别的生命体(物)的目的的实现。人的目的即幸福,是获得的或主动争取来的,而不是主要以自然的方式达到的(亚里士多德)。其他生命物的活动的目的是自然实现的,即主要依赖蕴藏于其体内的基因编码来实现。人的活动的目的的实现则主要借助人的理性的运用,依靠运用理性的活动,是实践理性更为积极地参与其中的过程。正因为如此,奥斯特沃特(Ostwald)鲜明地指出,人的目的的实现活动的意义,就是“积极地”从事这些属于人的实践的生命的活动。任何其他生命体

(物)都未曾达到具有理性和理性的活动的水平。

理性指引的繁荣不仅为生命物注入生命的活力与动力,促使生命物更为积极地强化其生存能力,而且能够使其保持与持续提高生命力所需要的诸种环境要素进入良性的或正反馈的生成过程。人的活动不在于他的植物性活动(营养、生长等),也不在于他的动物性的活动(感觉、本能等),而在于他的灵魂的合乎逻辑(理性)的活动与实践。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是人特有的,如果我们假定人具有一种区别于动物的更好的活动,我们就应该把它归之于灵魂的这个理性部分的活动。虽然这个结论现在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总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们认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唯一差别在于其具有更高水平的理性,在于其能够充分运用理性,并能够主动地利用各种方式发展理性或促进理性水平的迅速提高。正如著名生物学家威尔斯所说,“人类明显地和其他的物种不同是因为我们的智力之故,所以我们可以活着的生物体世界中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在过去的几千年来,我们有能力改变了整个生态系统——甚至完全地摧毁它们,例如在中东地区的许多地方,正因为农业的发明而造成巨大的改变”(威尔斯,2010:28-29)。

然而,几千年过去了,实践理性积极地参与人的目的的实现活动只在特定社会中得到了有效的实施。来自不同社会的人们,至今仍然

不断地追问:繁荣的社会为什么不是这个而是那个。正如被称为新几内亚(New Guinea)最具魅力的政治家 Yali 所追问的,“为什么是你们白人发展出了如此之多的车辆并将其带到新几内亚来,而我们黑人却几乎没有任何能力生产属于我们自己的车辆?”这是著名社会生物学家戴蒙(Diamond)在非洲考察时被不断追问的问题。戴蒙在《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一书中将各种类似的追问总结为:为什么有些民族在好几千年前就发展出傲人的文明,为什么有些民族至今仍生活在石器时代?其间的巨大差异是怎样造成的?难道有些民族天生就比较聪明吗?为什么财富与权力在世界范围内是现在的分布样式而不是其他样式?为什么不是土著印第安人、土著非洲人以及土著澳大利亚人猎杀、征服或灭绝了欧洲人和亚洲人,而是相反?

生命之德在于生生不息,不能生生不息的生命体已经是腐败的生命体,不能有效实现生命体目的的环境必然呈现出一片萧条、衰败的景象。萧条、衰败的环境必然使生命体进入恶性循环的竞争,从而使生命体感染上或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①,促使个体成为繁荣的“隐德来希”此时却转换成为个体使整体生存环境萧条、衰败的推波助澜者,因而也成为抑制繁荣的非道德的生命体。

^① 1973年8月23日,两名劫匪闯进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一家银行,绑架了6名职员。令人惊奇的是,人质获救后却想念起劫匪,其中一名人质竟爱上了绑匪,跑到监狱要与他私订终身!专家将这种现象命名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专家认为,构成“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条件:一是生命受到威胁;二是绑架者有小恩小惠行为;三是被绑者与外界隔离,信息被绑架者控制……但另一条件常被忽略,这就是——恶人威严所产生的魅力。这正如奥地利著名学者弗朗茨·M.乌克提茨在《恶为什么这么吸引我们》一书中所说,犯罪和罪犯身上甚至常常散发出某种魅力,令人很难拒绝。瓦特松曾经写过:“恶享有某种特权。它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坏蛋身上有一种引人遐想的力量,而这是任何一位美德的使者都望尘莫及的。”

繁荣的公平基础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努力思考与探索繁荣的来源。虽然在浩瀚的中国古籍文献中,可以清晰识别出社会教化或治理的不同的思想主张及其间的差异,如孔、孟倡仁义教化,墨翟主天下兼爱,老、庄言无为淳朴,但其核心均为公平或以公平为轴心。

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兴盛、繁荣与衰败,本质上是公平实施程度的大起大落的过程。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2100多年间,中国历史演变的一个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封建王朝的不断更替与转换。各不同时期王朝的更替与转换除了外族入侵这一因素外,均为造始于“官”逼而兴的农民起义运动:在各种不同但都以“公平”或“公正”为核心的某个旗帜下,农民集结起来,以牺牲生命为代价推翻丧失公平、公正的旧王朝,并试图重新建立一个当时人们向往与追求的新王朝。例如夏人的“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黄巾起义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王小波等的“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等均之”以及钟相扬的“法分贵贱,非善法;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等。虽然一些王朝持续时间长一些,如西汉、东汉、北宋、南宋各近200年或200年以上,唐、明、清更长一些,近300年;一些王朝持续的时间则较短,如秦朝、隋朝等,但均经历了兴盛—停滞—衰亡的过程。封建王朝的此亡彼兴,此兴彼亡,不仅像走马灯一样不停地转换,而且正如黄炎培先生所言:“真所谓

‘其兴也淳焉’,‘其亡也忽焉’。”

雅典民主政治领导人伯里克利在《丧礼上的演说词》中运用极其夸张的修辞手法,不仅极其自豪地表达了雅典的繁荣与优越,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雅典找到了繁荣的秘诀:公平或公正。正是由于公平或公正,雅典公民能够像关心自己私事那样关心公共生活,并使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正是由于公正与公平,法律才具有约束力;正是由于公平与公正,雅典政府才享有威信(萨拜因,1990:32-33)。正是由于公平与公正,伯里克利才自豪地声称,“雅典是希腊的学府”。雅典是个人天赋能力的最完善的训练学校,从而整个社会充满各种乐事的文明生活,拥有物质方面的舒适、艺术方面的高深造诣、精神方面的宗教活动和聪明才智自由发展或发挥这种任何社会都渴望的最宝贵的财富(萨拜因,1990:40)。

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是一切德行的总括,是贯彻一切德行的最高原则。这与中国法家始祖管仲的“礼义廉耻”,墨子的“贵义”在本质上几乎完全相同,均认为公平或公正是百德之王,因而公平、公正“比星辰更让人崇敬”(亚里士多德,2003:130)。

古今中外伟大思想家之所以如此看重公平或公正,不仅在于公平、正义本身就是人的本性之体现,是人的价值追求之所在,犹如孟子所说,“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圯也”(《孟子·离娄上》),还在于其既在构成社会互惠的基础同时也构成贯彻与实施社会互惠的原则,从而能够最有效地生成繁荣并使繁荣成为具有不断自我强化的趋向。如管子所云:“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

私,故小大莫不载”(《管子·形势解》),“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卷一·牧民第一》)。

社会分工、互惠与协调机制

事实上,人类“所以能不期而共趋于”更为高级的社会组合,在于这种高级的组合能够给人们带来更为优良的生活,在于这种生活能够实现更高水平的互惠。因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公平或正义,就是不同品类的物品和服务,甚至更为广泛地,各种不同活动的互补性或“等值补偿”、“互相补益”,也就是各种活动间的持续的互惠:每个个体给予社会的正好等于他从社会中所获得的;每个个体从社会中所获得的也正是其给予社会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能够尽最大可能地促进这种互惠能力的迅速提高和发展的政治团体就实现了所谓的“善治”或正义,也就完成了政治社会发展的自然状态,从而达到了社会均衡的和谐状态。正如柏拉图所说,除了自然因素或战争所致之外,“那种将生活水平缩减到最低限度的必需品上去,是‘猪的国家’而不是人的国家”(柏拉图,1997)。

人类知识的分化和专业化研究领域的兴起,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知识的进步、扩散和积累,有效提高了人类的理性水平。然而,如同任何领域的分工一样,专业化也带来了知识的不平衡增长。由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演进对物质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绝对依赖性,研究财富的生成过程、条件和一般规律的学科——经济学,自近代以来成为社会科学的主导研究范式。现代经济学以商品交换作为建构整个理论大厦的逻辑起点,从而使商品交换关系这一仅反映出人

类互惠关系的冰山一角的概念,似乎包含了人类互惠关系的全部内容,获得人类理性和智慧的如此重视,且几乎占据了人类的全部理性和智慧,而无暇顾及人类互惠关系中更为深远、更为广大和更为重要的内容。

事实上,互惠具有极为丰富的社会基础性的(socially fundamental)内涵。互惠是个体间总和性的和持续的相互依存与互补性活动关系,是个体间总和性社会活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社会互惠性增溢价值或社会合作性增溢价值的分享关系。互惠是互惠主体、合作或联合行动以及互惠性增溢价值分割的有机统一。不同的互惠主体、不同的联合行动以及不同的互惠性增溢价值的分割方式将产生不同程度和水平的互惠,因而互惠是行为主体互动而内生决定的一种涌现性结果。

互惠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产生“社会互惠性增溢价值”或潜在收益的基本源泉,因而能够有效地生成繁荣。

一、互惠能够形成“社会互惠性增溢价值”

在一系列条件约束下,特别是在知识、科学和技术水平的约束下,或在马克思的一定生产力水平的约束下,社会在原有个体间联合方式或互动方式的情况下能够创造出一定的社会价值或财富,我们称为“一般社会价值”或“既有社会价值”。在这一系列约束性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仅仅通过重新调整或确定个体间互动方式,仅仅通过调整个体间联合的方式,就能够形成一种新的生产力,即互惠性生产力或联合的生产力,或马克思所说的“扩大了的生产力”。这种“扩大了的生产力”能够获取到以

前没有获取到的、潜在的社会收益。这种联合或互动方式的调整因而在社会价值创造方面产生了一种“总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应。因此,个体间互惠性的合作、互惠性的互动形成的这一总和的社会价值将超过“一般社会价值”。这一超出“一般社会价值”的部分,原本是一种潜在的、没有被任何社会成员获得的社会收益,仅仅因为人们之间形成了某种互惠性的或互补性的互动关系而变为现实的社会收益,因而我们称为“社会互惠性增溢价值”,或“社会联合性增溢价值”,或简单地称为“互惠增溢”。良好的制度或所谓的善治,就是在一系列条件的约束下,通过调整个体间互动方式形成一种新的联合,这种新的联合不仅能够形成更大的社会互惠性增溢价值,而且能够在人们可接受的范围内分配这一社会互惠性增溢价值,从而不仅使“潜在的社会收益”变为现实的社会收益,而且使这一“社会互惠性增溢价值”最大化。

下面的两个例子说明了在互惠机制存在与否的情况下所形成的“一般社会价值”与“社会互惠增溢价值”的区别。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这一经典著作中提供了一个有名的例子。卢梭写道:“如果一群猎人出发去猎一头鹿,他们每一个人都意识到,为了成功地猎到一头鹿,每个人都必须忠实地坚守自己的位置;然而,如果一只野兔碰巧经过他们中的某一个人附近,毫无疑问他会毫不迟疑地追逐它,一旦他获得了自己的猎物,他就不太关心他的同伴是否错失了他们的目标。”为了理解这种情形可能形成的结果,需要将这一情形具体化。假设仅有两个猎人,他们必须同时决定是猎鹿还是猎兔。如果两个均决定猎鹿,那么

他们会成功地猎到一头鹿,并在他们之间平均分配这一头鹿。如果两个人均决定猎野兔,那么他们每个人可以得到一只野兔。如果一个人决定猎鹿而另外一个决定猎野兔,则前者一无所获而后者可得一只野兔。对于每个人来说,得到半头鹿均好于得到一只野兔。上述猎鹿情形可以抽象为一个博弈,每个人具有两种策略选择,猎鹿与猎兔,不同策略选择所得到的收益可以用支付矩阵来表述(见表1)。

表1 猎鹿博弈

		猎人2	
		猎鹿	猎兔
猎人1	猎鹿	2, 2	0, 1
	猎兔	1, 0	1, 1

显然,这个博弈存在两个纯策略纳什均衡,(猎鹿,猎鹿)与(猎兔,猎兔)。在没有其他相关干预机制影响猎人策略选择的情况下,两个纳什均衡都有可能发生。(猎鹿,猎鹿)明显的是(猎兔,猎兔)的帕累托占优均衡。(猎兔,猎兔)的社会选择形成一个“一般社会价值”,其大小为“ $1+1=2$ ”,而若存在某种互惠性干预机制或互补性机制时,(猎鹿,猎鹿)将成为唯一的纯策略纳什均衡,其形成的社会价值为“ $2+2=4$ ”,其与“一般社会价值”的差额,“ $4-2=2$ ”,即为“社会互惠性增溢价值”,或“社会协作性增溢价值”。

另外一个例子则更为鲜明地展示了是否存在互惠性协调机制对于是否形成“互惠增溢”的效应。假设两个人同时参与一项工作,每一个人有两种选择,努力($s_i=1$)与怠工或偷懒($s_i=0$)。两个人活动的总产出为4(s_1+s_2),两个人共享其劳动成果并且平均分配其总产出,

但每个若努力工作则要耗费 3 个单位的成本,若怠工则无须耗费成本。在此情形下两个人的不同策略选择将形成如下的支付矩阵(见表 2)。在没有互惠机制存在的情况下,每个人的最优策略选择是偷懒,因而偷懒是该博弈的纳什均衡,每个人都没有得到任何收益。此时的“一般社会价值”为 0;若存在某种互惠机制,则每个人会选择努力这一策略,在这种情形下,每个人得到 1 的收益,整个社会的产出价值为 2。因而在互惠机制存在的情况下,形成了一个价值增值,即“ $2-0=2$ ”。

表 2 团队中的道德风险博弈

		参与人 2	
		工作	偷懒
参与人 1	工作	1, 1	-1, 2
	偷懒	2, -1	0, 0

二、互惠能够有效促进“分工—交易”的循环式相互促进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城邦的长成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亚里士多德,1997: 7)。群体社会或城邦之所以能够给人们带来更为“优良的生活”,在于城邦内自发的互惠机制有助于社会分工的发展,而分工的发展带来了“扩大了的生产力”。人类社会最大的优势便是劳动分工,因为劳动分工使人类社会比其各部分简单相加之和更具力量。

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城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城邦是许多分子的集合,因而存在大量具有不同“品类”的个体。“品类”各异的个体的大量存在,决定了城邦中的这些“品类”各异的个体具有不同的偏好与需求,因而基于互惠

的交易机制的存在能够有效满足差异性偏好与需求。一些人酷爱白菜,一些人酷爱土豆;一些人酷爱诗歌,一些人酷爱鸡鸭鱼鸟;一些人酷爱茶叶,一些人酷爱咖啡;等等。这些偏好与需求不同的个体,其需求是否得到有效满足,直接决定其幸福感。基于互惠的交易机制的存在为满足不同“品类”个体的偏好与需求提供了机会与可能性,因而使其可在不同可能性中进行“权衡取舍”,进而有效提高了其幸福感。

“品类”各异的个体的大量存在也决定了具有不同技能与专长的个体的大量存在,因而分工与交易机制的存在既能够有效发挥个体的“绝对优势”(absolute advantage)也能够发挥其“相对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自然对每一事物各赋予一个目的;只有专用而不混杂使用的事物才能有造诣最精当的形性”(亚里士多德,1997: 5)。每个人都有其特定的优势方面,如果专门从事能够有效发挥其“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的活动,其活动结果自然好于其他人,并且能够在从事相应活动中进一步完善、推进其优势。姚明与刘翔分别具有打篮球与跑百米的相对优势;齐白石、李白分别具有绘画创作与诗歌创作的比较优势;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康德以及黑格尔等具有沉思的相对优势。这些人从开始的在某些方面具有的比较优势,经过专业化以及不断从事其所在领域的活动,其相对优势得到进一步的提升,终于将这些相对优势转换为绝对优势。

这些品类相异的人们,各以其所能生产其他人所需要的物品,通过交易,在满足了其他人需要的同时,自己也获得了相应的报酬,获得了与其优势相适应的收益或效用。“不同品

类的人们各尽自己的功能来有所贡献于社会，也从别人对社会的贡献中取得应有的报偿”，从而使全邦人的福利都获得了提高，各自从分工体系中都获得更多的正外部性效应。反过来，“通工易事，互相补益”激励了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不同品类的技能获得进一步的提高，每个人的需求满足程度不断提高，城邦的总体福利水平进而在这种“分工—交易”的相互促进中不断上升（亚里士多德，1997：45-46）。

三、互惠能够有效促进互惠能力与互惠机制的不断扩展

分工引发新的分工，进而引发新的交易；交易的扩大进一步推进交易，也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然而不论是分工的细化还是交易的扩展，必定都以特定的方式存在，并生成特定的分工规则与交易规则。由于这些新的规则是在原有互惠规则下生成的，从而进一步促进了互惠关系与互惠机制的扩展与完善，从而将某一领域或空间中的互惠机制与规则嵌入其他领域或空间中的互惠机制与规则之中，使社会嵌入一个更为复杂也更为精细的互惠机制与规则不断更新的网络中。

随着“分工—交易”的正反馈循环的逐渐推进，必然会推动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从而为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密化提供了可能性。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密化，社会各不同领域之间及各领域内部交易活动日益增加，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各个不同方面水乳交融、相互渗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其他各种各样关于社会的划分边界，随着“分工—交易”的正反馈循环的逐渐推进，日益变得模糊不清，社

会政治、经济、文化、心理乃至艺术，都浑然一体，形成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社会成为一个多维因素的连续体，从其中切割出的任何一块都包含这个连续体的所有方面。基于互惠的“分工—交易”的正反馈循环逐渐将人类社会变成由无穷多原因的互动所结成的无缝网络（曼，2007）。

联结这种复杂网络中任何两个或多个节点的必然是互惠机制与规则，否则这一网络将因为联通缺失而崩溃。这种复杂网络的维持与持续存在表明互惠能力与机制得到了有效强化。因此，多重交叠与交错的日益复杂的社会互动网络，既是社会互惠能力与互惠机制不断提高与强化的结果，也是新的互惠能力与互惠机制生成的动因与机会。

人类历史上不同社会的兴衰过程正是新旧互惠能力与互惠机制生成与转换的过程。那些能够在人类社会整体处于这种转换过程中实施互惠能力与互惠机制更新的社会，正是现今存在的那些社会或族群。而如今我们已经不知道或被忘却了族群，则在这种转换中由于没有能够实现成功的互惠能力与机制的转换而在自然选择中被淘汰而消失了。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认为的那样，不论人类社会是否为“一个人对所有人的战争”（赫胥黎复述霍布斯的话），实际上那些最适于生存的动物是最善于与他者合作的。“如果自然界的进化把人与人放入角斗场的话，那它同样地赋予他们寻求相互间互惠互利的本能。如果你问题自然‘谁最适合生存’，答案不言而喻是那些有互惠互助习惯的”生物或群体（里德雷，2003：6）。

公平、繁荣与政府行为

基于公平的互惠能够有效促进“分工—交易”的正反馈循环的持续推进,从而有效促进社会财富的生成,促进社会不断向帕累托占优均衡演进,进而推动社会不断走向新的繁荣。对于这种状态与过程,亚里士多德满怀感恩之情地说,“最先设想和缔造这类”基于互惠而形成的“团体的人们正应该受到后世的敬仰,把他们的功德看作人间莫大的恩惠”(亚里士多德,1997:9)。然而,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人类社会不断经历着分分合合,人类组成更大规模社会的可能性不断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威胁和挑战;人类不断地在分享基于互惠而形成的社会的“莫大恩惠”与承受社会解体的“巨大痛苦”中循环;不同社会中的人们并没有等同地分享到互惠社会的这一“莫大的恩惠”。那么为什么有些社会能够持续地维持与推进基于公平的互惠机制与规则,而有些社会则没有获得或不能持续维持这种互惠机制与规则呢?

事实上,历史上众多思想家已经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亚里士多德认为,为了回答为什么社会互惠机制与规则在有些社会中能够持续地存在而在其他社会中从来没有存在过的问题,必须研究社会的政治现象与问题,研究何种体制或政府形式能够持续维持这种社会互惠关系的持续存在。卢梭曾经谈到,对道德风尚进行的历史研究使他扩大了眼界,使他看出一切问题在根本上都取决于政治,而且任何民族永远都不外乎使它的政府的性质使他成

为的那个样子(卢梭,1997)。正如莱克汉姆(H. Rackham)所说,一个人注定要在社会中,并且要在一个旨在促进每个公民的福利的、组织良好的社会中,获得他的善(Aristotle, 1926)。

政治以及政府对于持续的社会互惠关系存在的重要性,对于一个社会能否获得基于公平的互惠机制与规则的“莫大的恩惠”或其对繁荣与萧条的重要影响,在于其对于互惠机制与规则能否持续所施加的影响。如果政府能够基于公平、正义来治理社会,如果政府受公平、正义的监督与审视或限制,公平、正义就能够得到伸张与扩展,基于公平、正义的互惠机制与规则就能够得到持续的推行与实施;如果政府不是基于公平、正义来治理社会,如果政府不受公平、正义的监督与审视,各种不同社会势力,特别是政府权力的掌握者,就会凭借其势力强大或凭借其掌握的公共权力而任意蹂躏、践踏公平、正义,任意掠夺社会财富,基于公平、正义的社会互惠机制与规则就将不再存在。这样的社会就不可能获得或享受到基于公平的互惠机制与规则的“莫大的恩惠”,因而也不可能趋向繁荣而只能趋向萧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说,城邦(的治理)必须以公平、正义为基础和原则,因为由公平、正义衍生的礼法,可凭以判断[人间]是非曲直,能够维持基于公平、正义的互惠机制与规则的持续存在。公平、正义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

政治以及政府对于持续的社会互惠关系存在的重要性及其对繁荣与萧条的重要影响,不仅为历代思想家所谙知,也为历代统治者与民众所熟知。早在1340年左右,意大利的城市国